

離亂杭州

——戰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

胡曉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杭州富庶繁華，又有西湖依傍在側，從來是四時遊賞之地，士女閒都之所。這個城市的聯想是奢華、藝文、才情，以及西子般的美貌麗容，蘊藉風流。然而杭州也是江南要地，更曾是多朝帝都，改朝換代之際，又何能憑斯文一派躲過兵燹？戰亂一向是城市歷史記憶重要的一環，於杭城亦如是。每逢兵禍，因城市人口密集，又有城牆與外界隔絕，故堅守則往往困於糧運阻斷，一旦城破，則不免集體劫殺焚掠，在極短的時間可造成極大的破壞。當此之時，以文為事者，雖身遭離亂，仍多有以耳聞親見的經歷筆之於書者，大約總是希冀一己之見，能為事件留下見證。然而所謂「見」，實不只是「視見」，也是「識見」，因為記載者總是寄寓了自己對事件前因後果的理解與判斷。亂定之後的諸多追述，其歷史詮釋與評價的企圖就更明顯了。本文所論，便是在此基本認知下，閱讀一系列與戰亂概念相關的記事文學，而聚焦於杭州，特別是與太平天國軍隊兩度陷城前後有關的材料。我在這裏籠統使用「記事」一詞，主要是為了與嚴格文類意義的「敘事文學」區隔。在戰亂中，或緊接著戰亂之後寫出的文字，以詩、文為主，戲曲、小說通常是較為後起的。這些詩文作品主要在記述事件，然後議論臧否，因此概稱為「記事」。這些數量龐大的文本，通常不在傳統文學批評的考慮範圍之內，也談不上經典意義，然而正因為這些文本往往呈現駁雜、無秩序的特性，且具有強烈的個人性與地域性，所以當這些與記事文學表面要求的敘事邏輯發生衝撞時，文本的裂縫猶如撕裂的傷口，又引我們探測歷史的深度、心靈的幽黯與文字的魔力。

一、不離錢塘，永無兵燹——咸豐以前杭州的戰爭記憶與死亡聯想

據說宋仁宗時，處士徐冲晦在家訓中訓示子弟，杭州乃是善地，永無兵燹，故子子孫孫，宜世世不離錢塘。豈知徽宗宣和年間便出了方臘之變，杭城居民十死其三。徐冲晦的預言，承平時期用以稱美，動亂時期便可資感嘆甚或反諷。民國時期，鍾毓龍(1880-1970)編著《說杭州》一書，其第八章「兵禍」便羅列東漢以來以至日本占領杭州的多次兵革事件。據鍾氏的統計，杭州之兵禍自後漢獻帝時錢塘大帥彭式稱兵起，至民國丁丑歲(1937)日軍陷杭止，大小凡三十七次。其中戰況比較激烈的，有北宋的方臘之變，以及宋金對抗時金兀朮兩度入杭等，而最慘的是常遇春攻打張士誠部隊控制下的杭州，當時城中絕糧，居民多餓死¹。當然，若論留下的紀錄最多，又最為人熟知的，則是明清鼎革之際的動亂，以及清代咸豐年間太平軍兩次攻陷杭州的戰役。入明以後，文學作品觸及杭州戰亂的不少，在這個城市宴樂浮麗的表層之下，隱隱埋藏了戰爭苦痛的記憶。動亂結束之後，人們反省戰爭，或者為其屠戮找出理性化的線索，或者俯伏於無親天道之下。然而往往更動人心弦的，是對戰爭之前的太平景象的思憶，那如夢似幻，如露之晞，卻分明曾經存在的繁華一瞬。我以為，正是這些因素的累積，使得杭州的繁勝，正如其他諸多所謂歷史名城，總是暫時遮蔽著隨時可能破出的幽黯。這是與感傷、神秘、危險、毀壞以及死亡緊緊相連的深層幽黯。

而杭州與城外西湖互為參照，還有一層女性化的聯想²。值得留意的是，在文化傳統上佳人的隱喻很豐富，不單指向美貌，還有薄命、貞烈、傾城、毀滅等等，故而一旦將杭州及西湖比為美人，那麼其繁華面固然平添媚態，但其幽黯面卻也更難捉摸。筆者在本節並打算討論直接「記載」杭州戰亂經驗的作品。我希望呈現的，乃是根源於綿長的歷史與苦澀的集體記憶，在城市的炫麗外表與勝景的佳美情懷的底層，所潛伏埋藏的對死亡與毀壞的恐懼，或者想像，而美麗與毀滅，又都以陰性的符號賦予象徵。

¹ 鍾毓龍編著，鍾肇恒增補：《說杭州》，收入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1冊，頁5-6。鍾毓龍，杭州人，終身為教師，曾任浙江通志館副總編。著有《中國神話史》、《說杭州》、《浙江地理考》等。

² 筆者在〈聲色西湖——「聲音」與杭州文學景味的創造〉（《中國文化》25/26期〔2007年秋季號〕，頁72-92）一文中已就此一層面有所論述。

明朝開國重臣劉基(1311-1375)有〈悲杭城〉一詩，詩云：

觀音渡頭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健兒披髮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
憶昔江南十五州，錢塘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豔舞清歌樂終日。
割臙進酒皆俊郎，呵叱閑人氣驕逸。一朝奔迸各西東，玉盃金杯散蓬華。
清都太微天聽高，虎略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河慘蕭瑟。
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³

此詩所述是劉基目睹杭州在元末所遭的劫難。作者對比了戰前的豔舞清歌與亂中的山河蕭瑟，號稱最富庶的錢塘，如今但成追憶。劉基雖然並非出身杭州，但的確是浙江人，他的悲傷有個人心理基礎。當然，劉基其實寄寓感於感慨，他所批評的是雄藩（指張士誠）當日的貪逸無狀，而今安在哉？後來田汝成(1503-1557)⁴輯錄杭州資料，在《西湖遊覽志餘》卷六專列「板蕩淒涼」一條，正是因為戰爭的記憶是塑造城市性格的重要元素，其中引述劉基〈悲杭城〉一詩，不但藉以憑弔元明之際杭州的劫難，也繼承了劉基對浮靡風氣的批判。此種論調，後文將再行討論。

其實，除了對本城戰亂的記憶以外，杭州的另一個與戰爭相關的重要歷史記憶是英雄與忠臣。埋骨杭州的英雄中，南宋的岳飛(1103-1141)與明代的于謙(1398-1457)大約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岳飛是河南人，冤死於京城杭州，平反後葬於西湖邊的棲霞嶺，立「宋岳鄂王墓」。于謙本是錢塘人，死在明代的京城北京，而歸葬於杭州的三臺山。岳飛自是南宋名將，身為文臣的于謙也曾大戰蒙古也先，兩人雖然異代，卻因為同葬杭州，而在當地並稱兩大忠烈標竿，紀念詩文多如繁星。就連以民間生活情趣為主調的西湖竹枝詞，一旦體裁為文人所襲用，也曾出現這樣的作品：

山川不朽仗英雄，浩氣能排岱嶽松。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對北高峰。⁵
這首竹枝詞出自明末清初的黃周星(1611-1680)之手。南高峰與北高峰都是西湖勝景，而以南高峰、北高峰雙峰並提，則是西湖竹枝詞諸多程式中相當常見的一種，內容多以景物、習俗、男女之情為主，而黃周星則將之轉化為英雄的頌讚，以南北高峰作為忠烈崇高的形象。我們可略舉數例，以見黃周星如何轉化雙

³ [明]劉基著，林家驪點校：《劉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95。

⁴ 田汝成是錢塘人，明嘉靖五年進士，撰有《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等。

⁵ [清]黃周星：〈山川不朽仗英雄〉，見顧希佳選注：《西湖竹枝詞》（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頁120。

峰的聯想。元代楊維禎 (1296-1379) 便有此句：「勸郎莫上南高峰，勸儂（一作郎）莫上北高峰。南高峰雲北峰雨，雲雨相催愁煞儂。」⁶同是元代人的賈策則有此名作：「郎身輕似江上蓬，昨日南風今北風。妾身重似七寶塔，南高峰對北高峰。」⁷可見在元代文人所作的西湖竹枝詞中，南北高峰對舉已是描寫兒女眷戀、歡場留情的現成格式。明代的例子，如晚明的邢雲路有作：「南高峰頭雲氤氳，北高峰上雨紛紛。兩峰相對隔湖水，妾心愁雨又愁雲。」⁸或邵泰寧之句：「外湖水是裏湖水，南峰雲挽北峰雲。」⁹亦皆以雙峰之秀景連結情意之纏綿。但在黃周星的竹枝詞中，西湖的綺麗風情，卻不再指向兒女私情，一變而成山川浩氣。甚且，山川之不朽，不在於己身之價值，而在於識英雄烈士精魂之賦形。王思任 (1575-1646) 的〈于忠肅墓〉詩云：

涕割西湖水，于墳望岳墳。孤烟埋碧血，太白黯妖氛。
社稷留還我，頭顱擲與君。南城得意骨，何處暮楊聞。
一派笙歌地，千秋寒食朝。白雲心浩浩，黃葉淚蕭蕭。
天柱擎鴻社，人生付鹿蕉。北邙今古諱，幾突麗山椒。¹⁰

此詩中，王思任同樣將于、岳對舉，同時又點出杭州「一派笙歌」的繁華城市背景，於是突出英雄犧牲的壯烈與杭州的遊賞特質之間，自有一種似乎相悖卻又彼此烘托的張力關係。也就是說，元末明初的劉基感懷杭州遭難，出於較為單純的興亡之嘆，以及對豪奢風氣的批判，黃周星與王思任在明末的作品，卻已將忠烈英雄的精神、事蹟，以及他們所牽涉的血腥戰爭，與西湖之佳勝完美地結合起來了。對動亂的記憶，對忠烈的崇拜，對現實的焦慮，都是他們遊賞體會西湖之美的一部分。張岱 (1597-1679) 在明亡後作《西湖夢尋》來追憶國變前的杭州，他之回憶西湖，本以風月勝景為事，然而在談到「岳王墳」、「于墳」等地方時，同樣是把忠烈之士的歷史記憶與西湖之美融為一體。

這種特殊的情感，與明末的情境似乎脫不了關係。明亡前夕，杭州仍多宴樂，但戰亂則即將由記憶變為現實。廣東文人黎遂球 (1602-1646) 後來成為南明

⁶ [明] 楊維禎編，《西湖竹枝集》，見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26 冊，頁 83。

⁷ 同前註，頁 88-89。

⁸ [明] 邢雲路：〈妾心愁雨又愁雲〉，見顧希佳選注，《西湖竹枝詞》，頁 108。

⁹ [明] 邵泰寧：〈水色山光死不分〉，見同前註，頁 116。

¹⁰ [明] 王思任，《避園擬存詩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78 冊影印明末刻本），頁 199-200。

烈士，他在明末曾長期居住在杭州，著有《西湖雜記》，其中多是頌美西湖的篇章，但也收錄了以下兩首與時事關係密切的詩作。其一題作〈湖上同胡小范夜飲坐中聽其家元戎敬仲與房都護占明盛談往事〉，詩曰：

我客西湖已十載，濯足往往臨高溪。今季失意乃寒疾，束書枕琴眠招提。
欲歸未歸天氣好，買舟方上嚴灘道。湖頭詞客蘭橈過，銀燭相看樹星曉。
漁陽老將雄酒間，吳閭美人長眉彎。白眼瞠瞠向前語，曾立奇功山海關。
逆璫誅求意不足，銀鑊夜繫血如浴。黑獄沈沈竟失明，流落江南眠石屋。
坐中髯客復何爲，狂狷曾同袁督師。令箭初飛縋城出，騾裹牽來只讓騎。
罪案相尋連內閣，壯士何妨委溝壑。煅煉嚴刑死不招，督師磔肉如花落。
至尊意解不深求，忽蒙放出歸雲遊。逍遙獨釣湖天月，舊事傷心煙霧愁。
煙波慘澹生前席，酌酒與君望天色。英雄成敗古何常，得似扁舟五湖客。
胡郎別我歸城中，掀髯大醉凌寒風。相期更伴錢塘去，千頃潮頭駕短篷。
美人清歌笑回首，長笛一聲折楊柳。爲君舞劍復彈箏，玉腕還持一杯酒。¹¹

作者在湖上的宴會中，與曾經遭到政治迫害的兩位英雄聚會。其中一位抗後金有功，卻慘遭冤獄，之後流落江南；另一位是袁崇煥的部下，與他一同下獄，並遭到嚴刑拷掠，在袁崇煥死後，遇赦放歸。西湖的煙波，在英雄的自述中，令人聯想的不是逍遙，而是傷心的過去，以及可能更爲慘澹的未來。此時，西湖之美，宴會之樂，或者侍酒美人的善解人意，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另一首詩題作〈吳靜腑席上偕侯赤社晤方爾止〉¹²，其中享樂與征戰的對比，更爲彰顯。詩曰：

烽火徵兵望將旗，可憐吾黨但論時。滿堂客爲侯生贊，五字城憑方叔師。
酒半斷橋攜燭至，雪中枯柳認舟移。嬌歌妙舞江南樂，只是聞雞醉復悲。¹³

此詩再次將當下的歌舞宴樂與看似遙遠實則逼近的烽火並置，突顯了作者一千文友無力回天的悲愁，以及隨時準備加入戰爭的自覺。黎遂球在甲申後投入南明的復國工作，於丙戌年在贛州虔城殉國。此日宴中與他共論時局的朋友則度過了易代之難。根據查繼佐(1601-1676)爲黎遂球所作的〈傳〉謂：「甲申三月

¹¹ [明]黎遂球：《西湖雜記》，收入[清]丁丙編：《武林掌故叢編》（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華文書局，1967年），第5冊，頁2431-2432。

¹² 吳靜腑，其人待考。侯赤社，本名侯方夏，侯恂子，侯方域的兄弟。方爾止即明末清初名士方文(1612-1669)。

¹³ 黎遂球：《西湖雜記》，頁2432。

國變，公見所就義諸公，皆平日握手與深語者，益自憤痛哭，誓死爲國講復仇勤王策。」¹⁴上文所引的詩作，可說是明亡前夕南方文士之寫照。今釋澹歸（金堡，1614-1680，杭州人）爲《西湖雜記》作〈書後〉，則說黎遂球：「生之名士，死之鬼雄，忽而冰玉潔，忽而刀劍鳴，忽而虎豹變，忽而蜂蝶游，忽而雷電合，忽而風月麗，皆文人之心之跌宕而不可測者。……公乃不愧番禺文人冠冕矣！」¹⁵這樣的描述，雖然直接的指涉是黎遂球，又何嘗不可讀作西湖之小影呢？文人心跌宕不可測，正如湖上煙波千頃啊！

西湖風月與美人的聯想更爲普遍，也似乎與戰爭無甚關係。雖然如此，湖上佳人的系譜卻與忠烈碧血一般，頗沾有幾分死氣的。（東坡將西湖比西子，我們可別忘了她本來就是吳越大戰中的一顆棋子。）當然，女性對杭州的城市性格有決定性的影響，筆者之前已有所論述。香市裏推擠的女香客，元宵夜盛裝觀燈的大家婦女，以及湖船上吟詩清遊的才女，無不爲杭州女性化的一面作了最好的陳述¹⁶。清代某閨秀便直接將西湖稱爲美人湖，一連八首詩，都以美人作結，分別是「美人湖上美人家」、「美人湖上美人墳」、「美人湖上美人祠」、「美人湖上美人樓」、「美人湖上美人來」、「美人湖上美人題」、「美人湖上美人還」、「美人湖上美人魂」¹⁷。如此，則西湖與才子、英雄的連結一概暫時切斷，獨獨突顯美人。然而這個畫面其實有個很大的缺漏，便是「死佳人」。人誰不死？佳人亦然。然而清代中葉以後，杭州文人往往刻意將受難佳人與忠臣高士合而觀之，重新塑造西湖的歷史記憶。這樣的企圖乍看之下似乎與明末清初盛行的「貞婦與烈士」論調相呼應，若細觀則可知兩者之實質大不相同。簡單地說，清代中葉文人重新將女性帶入西湖記憶的工作，是在社會相對穩定時期充沛的文化活動的一部分。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與事蹟，當推杭州文人陳文述（1771-1843）一系列的重修祠墓活動。康正果曾精闢分析陳文述一生的文藝生活，給予中肯的詮釋與評價，並藉此呈現清代文人心理與文人活動的一些普遍現象¹⁸。根據他的解釋，陳文述看似豐富實則自我消解的諸多詩文創作，實在是當

¹⁴ 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3冊，頁1151。

¹⁵ 同前註，頁1152-1153。

¹⁶ 拙作：〈聲色西湖——「聲音」與杭州文學景味的創造〉，頁72-92。

¹⁷ 薛纖阿詩，收入陳文述編：《蘭因集》（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叢書集成續編》，第38冊影印《武林掌故叢編》本），頁862-863。

¹⁸ 詳參康正果：〈泛文和泛情——陳文述的詩文活動及其他〉，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727-760。

時熱鬧的文藝場域的產物，詩文超量生產的一環；癡迷於獎掖才女，也是文人與韻事、佳話這些概念結合的結果。所言極是。康正果同時討論了陳文述回到杭州後，修復諸多歷史人物之墳墓與祠堂的背景與動機。他認為這都是出於「思古情懷」，對當時的文人來說，可以表現文化道德關懷，表揚忠烈孝義，等於「物質化了的縣誌」，或說是一個「巨大的文本」¹⁹。此說亦有見地。而筆者以為，正因為修祠墓與文化道德關懷有關，故陳文述修西湖三女士墓，確應視為他個人重塑杭州歷史記憶的工作。佳人的祠墓，是歷史名城必備的死亡想像。

陳文述修復了不少名人祠墓，但他最重視的一項工程，是在西湖修小青、菊香、雲友三女士墓，並將事情始末以及眾人題詠結集，刊為《蘭因集》一書，所收包括王士祿(1625-1673)、施閨章(1618-1683)等人的詩，當然更少不了自己家族的女性，以及門下女弟子的貢獻。這三位女士，楊雲友是明末杭州名妓，傳說與董其昌關係密切，宋代的周菊香與明代的馮小青則是虛實難辨的人物，而陳文述一律將她們視為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女性，並且認為她們的共通之處便是薄命冤屈。他的側室管筠特別為此事寫了一篇〈西湖三女士墓記〉，根據她的記載，菊香、小青墓在孤山，雲友墓在葛嶺智果寺西，陳文述為之重修立石，「並建蘭因館於巢居閣西，小樓三楹，中為夕陽花影樓，右為秋芳閣，以祀菊香，雲友附焉。左為綠陰西閣，以祀小青」²⁰。管筠之所以如此投入，是因為她相信自己與小青之間有特殊的因緣²¹，甚至可說是小青後身。她在文章中特別發揮了小青的象徵意義：

筠以乙酉之初來謁墓下，徘徊祠壁，竊有感於嬋媛之遭際也。……（小青）愛之者以為千古第一有情人，憐之者以為千古第一傷心人矣。筠嘗讀其貽楊夫人書及焚餘草，遠籴孤燈，境何慘也；零膏冷翠，語何悲也；玉烟花蝶，觀何達也；絮果蘭因，志何決也。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慷慨成仁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卒之超輪消劫，禮佛以終，靚服明妝，留照而去，平心論之，殆千古第一之貞姬烈女歟？²²

小青故事流傳之後，成為薄命才女的原型，以及文人同情甚至認同的對象。但管

¹⁹ 同前註。

²⁰ [清]管筠：〈西湖三女士墓記〉，收入陳文述編：《蘭因集》，頁853。

²¹ 管筠自稱：「家慈夢大士攜青衣垂髻女子持雙頭蓮花而生余，說者以小青後身解之。」同前註，頁862。

²² 同前註，頁853。

筠的邏輯比較特別，她發揮了儒家倫理中女適人、臣事主的忠貞類比關係，逕行將小青定義為從容就義的女英雄，故小青不應與不遇文人比附，而應與忠烈之臣並提。甚至，由於殉身的過程有緩急難易之別，所以小青還比壯烈成仁的戰爭英雄更崇高。這麼一來，修立美人祠墓，便與奉祀忠烈具有同樣的高度了。也就是說，死佳人的文化聯想不只是紅顏薄命，而是貞烈犧牲。猶記黃周星「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對北高峰」之句，互讀之下，可知在文人的某種論說邏輯中，杭州的岳飛墓、牛皋墓、于謙祠，在深層意義上是與小青墓等同的。

總而言之，秀麗的山水，慘酷的兵劫，忠烈的英雄，薄命的佳人，這些都是共同組成杭州歷史記憶的重要質素，而且互相產生聯想。因此，太平與劫數，靡麗與毀壞，生命力與死亡召喚，當我們接觸杭州各種文史資料時，這些看似矛盾的力量都不斷同時湧現眼前。待到太平天國事件發生的清代中後期，歷史記憶的複雜與幽黯早已深深盤踞著杭州的繁勝意象。

二、城市的記憶與原罪

近代西歐城市興起之初，文學作品便往往將城市的腐敗與鄉村的真樸對立起來。唯有讓一個純潔的鄉下小夥子在因緣際會之下進入城市，見識浮華，窺視光鮮外表下的黑暗百態，並且親身遭逢險惡之後，他才能體會純樸生活的真實意義。這可能是許多早期城市小說的基調。現代的世界各大城市可能更為繁華、便利，也可能更為擁擠、雜亂，甚至成為罪惡淵藪。而我們仍不時聽說，某某人厭棄了大都會，但遠遷之後，又不覺懷念起城市生活，因為自由、機會、精緻、消費、娛樂、時尚、文化，早已成為某某人習以為常而不自覺的呼吸吞吐了。又聽說，另一個選擇離開城市的某某，全心擁抱新生活，往日的喧囂嘈雜，暗巷驚魂，真心掩蔽，都將封存在記憶的角落。傳統中國也發展出大城市，但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並沒有嚴格意義下的長篇城市小說。韓南 (Patrick Hanan) 曾指出，所謂城市小說，應以城市的公開或半公開空間為主要場景，對於該城市的里巷坊市，也有具體的描述，尤其必須呈現人在其中的經驗。根據韓南的研究，第一部中國的長篇城市小說當是一八四八年序，一八八三年才在上海出版的《風月夢》。這部專門以揚州為背景的作品觸及當地的語言、習俗、食物、音樂、娛樂等層面，成功傳達了城市的特性、文化與傳統，也就是所謂城市的「氣性」

(ethos)²³。當然，晚清以後，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小說就大大發達起來了。在城市小說出現以前，中國城市的面目與氣性經常出現在志書、遊記，以及夢憶體文字中。回憶北宋都城汴京的《東京夢華錄》便是最好的例子。記憶之為用大矣。

中國文學中懷念城市的作品，往往與對政治中心（京城）的渴望有關（正所謂「長安不見使人愁」），又或者是今昔境遇對比下的感嘆。明初，瞿佑以詩禍遭謫保安，在邊境過著蕭條的生活。田汝成記載，永樂年間，貶謫中的瞿佑分別在庚子與辛丑年元夕共作了六首〈望江南〉，以懷念故鄉杭州。庚子（永樂十八年 [1420]）元夕他寫道：

元宵景，淡月伴疏星。戍卒抱關敲木柝，歌童穿市唱金經，簫鼓憶杭城。²⁴
並且自註：「元夕城市寂寥，惟聞戍卒擊柝聲，幼童數輩，沿街歌唱佛曲而已。懷想故鄉，慨然有作。」次年辛丑年（1421）又續作四首：

元宵景，野燒照山明。風陣摩天將半夜，斗杓插地過初更，燈火憶杭城。

元宵景，巷陌少人行。舍北孤兒偎冷炕，牆東嫠婦哭寒檠，士女憶杭城。

元宵景，刁斗擊殘更。數點夕烽明遠戍，幾聲寒角響空營，歌舞憶杭城。

元宵景，默坐自傷情。破竈三杯黃米酒，寒窗一盞濁油燈，宴賞憶杭城。²⁵

杭州的城市特質，在邊境的對比，以及往事悠悠的心情下，更加突顯出來。若非邊境在元宵夜依舊漆暗，怎顯得當年在杭城所見的元宵燈火之盛？若非邊境人煙稀少，怎顯得當年杭城士女出入的熱鬧？若非邊境只聞單調淒涼的角聲，怎見得當年杭城歌舞遍地？若非邊境生活困窘，怎念得當年杭城宴會上的豐食美酒？若非邊境只聽孩童不成調的佛曲之聲，又怎憶起當年杭城簫鼓樂聲之悅耳？因為是特定的節慶，杭州繁勝的城市特質才在謫人的思憶中一一突出。此時，瞿佑肯定不會想起杭州元宵太過擁擠吵鬧，也不會擔心男女相雜有違禮教吧。

與其他城市相比，杭州依傍西湖是很大的特色，而且在人們的記憶中，西湖往往搶過城內的風采。尤其在文人的心目中，西湖才是感懷所寄的場所，是記憶的空間。君不見張岱（1597-1679）在明亡後思憶的，可不是杭州城內的里巷，而是城外的西湖。在《西湖夢尋》的〈自序〉中，他深刻思考失落之後，記憶與現

²³ 參見 Patrick Hanan, "Fengyue Meng and the Courtesan Nove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8.2 (Dec. 1998): 345-372。筆者之前探討的所謂「西湖小說」，則都是短篇小說集，見拙作：〈聲色西湖——「聲音」與杭州文學景味的創造〉。

²⁴ 見〔明〕瞿佑：《樂府遺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723冊影印明抄本），頁435。

²⁵ 同前註。

實對人產生的作用。他說，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一帶湖庄，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我夢中之西湖，尚得完全無恙也。……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從今而後，……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為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即嚙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²⁶

張岱寫此文時，已自稱老人，但仍對西湖念念不忘。然而這種思念，由於歷經戰亂毀壞與時代變遷，無法以舊地重遊來緩和。此時，張岱的策略是「保我夢中之西湖」，而無所取於現實中的西湖。因為記憶中的西湖與本人往昔的生活早已融為一體，是內在而非外求的，所以只要人在，湖便在。然而這種記憶的真實，欲透過言語文字傳遞，結果往往令人失望，正是因為接受者與這個記憶並無生命的接觸。張岱說他對兒曹言說西湖，只能當作魘嚙，即是此意。這也是《東京夢華錄》以降，諸多夢憶式文字的作者共同的無奈。

記憶城市，總是在繁華落盡之後，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記憶都如張岱的夢尋，如此戀戀。在戰亂中消逝的城市，究竟何以遭此厄運？因為痛惜，更想找出足以解釋大難的理由，於是城市的原罪便浮出了。當然，筆者在此只是借用原罪一詞，而非指涉基督教義。杭州樂土，西湖歌舞，終將誤國，這是許多士大夫發過的議論。元代的劉一清著有《錢塘遺事》一書，他便主張：「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大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喪師誤主，納土賣國，可為長嘆息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云。」²⁷他在稱賞西湖十里荷花的美景之餘，仍不忘再追加幾句憾詞：「然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²⁸這與南宋詩人林昇「暖風吹得遊人醉」的名句，實是異曲同工。並不是說杭州沒有天險，沒有屏障，或沒有腹地，而是因為杭州湖山之勝過於誘人，所以註定要毀人心志，使人身陷閒賞之樂而不治國事。

²⁶ [清]張岱：〈自序〉，《西湖夢尋》，《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頁171-172。

²⁷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選），收入[明]高濂等輯撰：《四時幽賞錄外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5。

²⁸ 同前註，頁6。

杭州之危險，差似傾國的佳人，媚主的妖姬。故而，在這個邏輯中，杭州實在從根柢上就不適合作為國都，這是杭州的本質，非人力可以改變。

在以上簡述的論調中，作為國都，杭州有人力無以挽回的先天劣勢，因為閒賞與治國有基本的矛盾。另一種相關的論調，則與杭州的社會風俗有關。也就是說，有斯土，有斯民，杭城既有享樂的天然條件，杭人便有奢靡浮華的惡習，安居時但覺是無邊樂境，一旦禍至，則遭天之譴，無所遁逃。其實，這種說法也便是歷史記憶累積之下，對災難與死亡潛存的恐懼感的表現。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餘》中便如此討論常遇春圍杭的事件：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為事，不習女工，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啖，又恐貽笑鄰里而止。至正十九年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米價湧貴，……一城之人，餓死者十有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湊集，聊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²⁹

此一圍城之役是杭州史上最慘酷的戰禍之一。因為城內糧盡，糧路不通，以致城內居民病餓死者極眾。大約基於報應不爽的邏輯，田汝成為了解釋杭人餓死的命運，便歸因於杭人以浪費飲食為代表的「尚淫奢」的生活態度。總之，人心澆薄，不勤不儉，競相享樂，這便是所謂「浮靡暴殄」的城市民風，終將招致天命的懲罰。問題是，即便提出此說的田汝成本人，在《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二書中，對杭州繁華與西湖風月，仍是一往情深，很難說他真心期待杭人一律放棄城市的樂趣，回歸勤謹儉樸的簡單生活。也就是說，浮靡是城市的本質，是城市的原罪，兩者往往相互定義。那麼，既然無法徹底改正這種浮靡的風氣，城市是否便只能永遠懷著一份刺激的罪惡感，等待不可預料但終將發生的天譴？

對一個相信天譴說的人來說，杭州在清代咸豐年間遭遇太平軍兩次攻陷，或許是這個城市發展到「四時行樂，靡麗紛華」、「無美不備，應接不暇」³⁰以後註定的結果。太平軍第二次攻打杭州時，杭州被圍兩個月，杭人又因為平日生活

²⁹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6，見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3冊，頁352-353，「板蕩淒涼」條。

³⁰ 這是杭人范祖述在太平軍陷城後所寫的《杭俗遺風》一書中對杭州的贊語。參見[清]范祖述：《杭俗遺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1。

安逸，惟以窖藏金銀爲事，從沒有大量貯存糧食的習慣，因此不久便耗盡存糧，居民紛紛凍餓而死。當時很多人便指出，這個情形分明是數百年前常遇春圍城的翻版。論者以爲，這都是杭人平日驕奢淫佚的報應³¹。城市既有浮靡的原罪，那麼當災難降臨時，最迫切需要拯救的就是腐敗的人心。因此，倖存者往往呼籲人們反省自身的罪惡，爲過去的錯誤贖罪。同時，由於當時整個江南皆受創，因此類似的反省意識也大量出現在勸善勸捐論述中。大慈善家余治(1809-1874)自署爲「梁溪晦齋氏」，在〈劫海迴瀾啓〉中大聲疾呼：「吁嗟乎！此何時？此何勢耶？此時此勢而猶昏昏未醒耶？……此正吾人憂勤惕厲之日，而非醉飽嬉遊之日也。……乃今日之人情果何如耶？縱欲忘反之習，最足以干天怒而召天殃。日前被難之民，未必不由乎此。予前過其地，見其奢華暴殄，心竊憂之，今果然矣！」³²這篇勸善書的激昂演說式文體，讀來與不久之後出現的革命語言頗爲神似³³，只是昏睡與醒覺之比喻的內涵卻很不同。作者提到的「其地」，指的是江南，但他所警戒的「縱欲忘反」、「奢華暴殄」以召天殃，他肯定會同意可以用來解釋杭城之被難。余治以江南人的身分對江北勸捐時，把「江南樂」的形象整個翻轉過來，塑造一種共業的想像。他在〈江北勸捐啓〉中說：

嗚呼，江南難民之苦，至今日尚忍言哉！……夫江南難民猶是人耳，其居心行事，非必大異於江北也；其團練巡防，非必遠遜於江北也。乃江南則烽火連郊，江北則黍苗盈野；江南則室家雜散，江北則婦子恬熙；江南則樹皮草根，搜掘殆盡，江北則煖衣飽食，宴樂如常。同是人耳，彼何不幸而生江南，此何厚幸而生江北耶？彼何罪何愆而爲天之所棄，此何德何能而爲天之所眷耶？豈江南之人皆可死，而江北之人多可免耶？豈江南之人皆無善足稱，而江北之人皆有福能消耶？³⁴

余治用一種迂迴的修辭，一方面承認江南人民的罪愆，同時痛陳難民之苦，一方面則暗示江北人民「其實我亦如是」，必須急起行善贖罪，日後才可能免於同樣

³¹ 說見鍾毓龍編著，鍾肇恒增補：《說杭州》，頁344-345。

³² 收入〔清〕寄雲山人（余治）編：《江南鐵淚圖》（臺北：廣文書局，1974年影印明清刊本及抄本），頁105-107。

³³ Tobie Meyer-Fong 在研究余治的專論中，則指出其演說文體實與太平天國的語言聲氣相通。見Tobie Meyer-Fong, "Cities of Sin: The Taiping War as Retribution for Urban Excess",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五日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入中國城市：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³⁴ 寄雲山人（余治）編：《江南鐵淚圖》，頁91-02。

的災殃。

杭州於同治三年被左宗棠收復。光緒年間，杭州名紳丁丙(1832-1899)將身歷其難者的各種記述輯為一編，題為《庚辛泣杭錄》，指杭州於庚申、辛酉兩度被太平軍攻陷。此書有曾經經歷庚辛之變的杭州人蔡玉瀛（生卒年不詳）為之作序，此序作於光緒二十一年，距太平軍陷杭，早已超過三十年，編纂者應該希望對此一對杭州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下一公斷，而作序者也意圖作一公允的評論。因而蔡氏的論說，仍舊圍繞著杭州城的原罪而展開。他認為，杭州風俗人心在唐以前是「樸質近古」的，所以北宋人徐沖晦才有「子孫世世勿離錢塘，可免兵燹」的斷語。然而，

逮乎南宋建都，王者之居，漸次宏麗，一百六十年中，踵事增華，東園游幸，西湖歌舞，上下相沿，習為奢華靡麗，閱數百年而不能易。一旦有事，則困粟空虛，兵力薄弱，束手而陷於寇盜。……此杭之可泣所由來也。知其由來，改絃而更張之，一洗泄泄沓沓之習，庶可奮忠義，崇節儉，純風俗，厚人心，而挽天意焉。³⁵

此序雖是老生常談，其實企圖翻轉杭州的歷史評價。原來，並不是杭州有湖山之勝，又風氣浮靡，使得南宋國家軟弱，而是政治中心首先敗壞了杭州原本純樸的質性。這可以說是為杭州「去罪化」吧。但無論如何，作者仍然主張奢華靡麗是杭州干犯天怒遭此大難的深層原因。自宋元以來，杭州戰亂的歷史記憶與城市的原罪感便是如此如影隨形，不可分割。

三、庚辛之役戰爭記事中的私人情感與公議空間

像太平天國這樣重要的事件，史料可謂汗牛充棟，而且由清廷、晚清革命派、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不同的觀點出發，詮釋與評價也相當分歧。歷代許多重要的戰爭都成為通俗歷史演義的題材，而且與民間對歷史事件的評價關係密切。那麼太平天國是否曾刺激通俗敘事的想像呢？而杭州文人又以何種形式記錄自己的經歷與意見？

由於太平天國與庚子拳亂相隔不過半世紀，便有學者比較二個事件在當時所

³⁵ [清]蔡玉瀛：〈庚辛泣杭錄後序〉，丁丙輯：《庚辛泣杭錄》（《叢書集成續編》，第166冊影印《武林掌故叢編》本），頁504。

得到的文字處理，根據這項研究，拳亂發生之後，即迅速在小說中得到呈現，而且馬上成爲新興新聞文體的書寫對象。相較之下，太平天國事件影響雖大，卻直到黃世仲(1872-1912)寫《洪秀全演義》(一九〇五開始連載，一九〇八出版)，才首次進入長篇小說，在此之前，此一事件主要的記載都訴諸文人筆記的形式。這是因爲太平天國影響所及的範圍以江南爲主，文化菁英衆多，筆記是他們最熟悉的體裁³⁶。同時，與前代感懷動亂時代的文章相比，這些江南文人對太平天國亂事記錄，似乎對政治象徵物(如崩毀的宮殿)等較不著意，他們的失落感主要來自江南園林與城市受到的無情破壞³⁷。筆者考察杭州文人對庚申、辛西城陷的處理，的確觀察到類似的現象。並沒有長篇的敘事文學集中處理庚辛之役，但是有很多以地方文人的立場出發，用日記、回憶錄等形式記載事件，以求保存自己一人一家的經驗，並爲杭州留下地方性的歷史見證的例子。這種由地方意識出發的努力，可以丁丙編纂《庚辛泣杭錄》爲代表。

丁氏本是杭城望族，雖然三世業商，但丁丙、丁申兄弟都是博雅的藏書家、書畫家與出版家，更熱心地方的慈善事業³⁸。兄弟兩人最爲人熟知的功業，便是在太平軍占領杭州其間，他們因緣際會地發現文瀾閣《四庫全書》在亂中遭到破壞，便全力奔走，搜羅殘帙。後來，凡缺漏部分，他們又四處尋覓底本，再僱人補抄，使得文瀾閣《四庫》得以恢復。在太平軍撤出杭州後，他還以全家之力投入地方的重建工作。丁丙除了出版大量有杭州文史有關的書籍以外，自己又編纂了許多以杭州爲主體的書籍，如《武林掌故叢編》、《武林坊巷志》(被稱爲中國最龐大的都市志)、《杭郡詩輯》、《武林往哲遺著》等等，可見他對杭州地方文化的保存實在不遺餘力³⁹。在他的編纂工作中，《庚辛泣杭錄》其實算是很小的一部書。此書之輯錄，乃搜集並節錄與庚辛之役有關的官方及私人紀錄多種，合爲一帙，分十六卷。耐人尋味的是，雖然有前文曾提到的蔡玉瀛作序，丁丙本人卻並未以編者的身分發言。他對整個庚辛之役的看法，乃是與其他被輯錄

³⁶ Rania Huntington, "Chaos, Memory, and Genre: Anecdot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7 (Dec. 2005): 60.

³⁷ *Ibid.*, p. 70.

³⁸ 有關丁氏家族的介紹，可參見沈新民：《清丁丙及其善本書室藏書志研究》(臺北：漢美圖書公司，1991年)。

³⁹ 有關丁丙的生平及其對杭州的貢獻，除沈新民的著作外，還可參考翁福清：〈杭州鄉邦文化的功臣——丁丙〉，《東方博物》第14期(2005年1月)。同是杭州人的俞樾與丁丙也是好友，丁丙死後，俞樾爲之作〈丁君松生家傳〉(松生爲丁丙別字)，可爲參照。

的各種作品攙雜在一起的。筆者以為，這樣的設計透露了編者特殊的用心，亦即《泣杭錄》一書並沒有統一的口徑，而是一個文本性的公議空間，容納同難諸人以不同的角度，或發抒情感，或記載細節，或評論國事。以下將就此一閱讀方式略作申述。

首先介紹《庚辛泣杭錄》十六卷各卷的大致內容。卷一至卷二為〈欽訂勦平粵匪方略〉，蒐集咸豐十年（1860，庚申年太平軍第一次攻城）到同治三年（1864，杭州收復）間有關杭州城陷與收復的奏報與上諭。卷三記錄昭忠祠的建置、旌卹與碑銘等。卷四記載崇義祠的建置，並錄官員仕紳的紀念文字。卷五記錄收埋無主屍骸的義烈墓的建置。卷六收錄陳學繩〈兩浙庚辛紀略〉。卷七為繆德棻〈庚申浙變記〉。卷八為許奉恩《轉徙餘生記》。卷九為華學烈〈杭城再陷紀實〉。卷十為李圭〈思痛記〉。卷十一上為張爾嘉〈難中記〉，記述數次被擄的情況。同卷下收錄張光烈〈殉烈記〉，記述圍城所見，以及其母殉難事。卷十二是秦緝業、陳鍾英的〈平浙紀略〉。秦緝業（1822-1883），曾任浙江鹽運使，修過《杭州府志》。本文記述乃官軍克復杭州的過程，基本上是官方觀點。卷十三是王定安的〈湘軍記〉。王定安乃曾國藩幕僚。本文強調曾國藩、左宗棠對收復杭州的貢獻。卷十四陸以湑〈杭城紀難詩〉及許瑤光〈蒿目集〉。卷十五收張蔭渠、吳淦的《杭城辛酉紀事詩》。卷十六是王震元編輯的《杭城記難詩編》。以上十六卷，每一卷都是一個特殊的聲音，代表一種面對庚辛之役的態度或角度。其間有許多重疊及互證，但也絕不乏矛盾與歧異。我們不妨就各卷所論，擇要予以檢視。

前兩卷〈欽訂勦平粵匪方略〉，第一卷述庚申年之役，第二卷述辛酉年圍城以至同治三年收復及撫卹。全文皆由朝廷的上諭與守城大臣的奏報組成，代表官方的紀錄與觀點。卷二結尾有丁申的案語，他在此說明自己早已有意彙錄庚辛兩役中的疆臣奏報與朝廷諭批，但難以完成，光緒辛巳年（1881）杭州文瀾閣復成，朝廷將《欽定勦平粵匪方略》頒給文瀾閣，丁申於是擷取其中有關杭州戰事的部分，刊錄於此。在此署名為「賞給四品頂戴五品銜候選主事」⁴⁰的丁申，將「方略」的意義定位為「兩朝之廟謨睿斷，以及當事之履險冒厄、摧陷廓清之烈，胥於是在」⁴¹。作為官方定版的「方略」置於《泣杭錄》之首，可謂必然。

⁴⁰ 丁申、丁丙兄弟皆因在亂中保存文瀾閣《四庫》而受到封賞。丁申獲光緒帝賞四品頂戴。

⁴¹ 丁丙輯：《庚辛泣杭錄》，頁301。

卷三到卷五記載的是亂後對殉難臣民的安葬、旌恤等安排。這些公共措施對於戰後地方人民的身心安頓，有巨大的影響。第三卷〈昭忠祠志〉所收，乃范承堃輯錄浙江昭忠祠之建置與歷年修繕之經過的資料，以及官員或文人所寫的碑文、祭文、謁記等。昭忠祠奉祀浙江殉難官員以及軍民婦女，所以號稱「以全省之忠義節烈合祠」⁴²。在本卷的附錄中，編者范承堃收錄了昭忠祠附建的幾座專祠的說明，包括張錫庚、繆梓、李福謙等殉難官員。其中，對「繆武烈公祠」的介紹，引用國史本傳，說鹽運使繆梓在咸豐十年太平軍攻城時，「陷陣殺賊，身被數十創，尚屹立罵賊不止，右足爲賊折，始仆。」⁴³這個細節初看是忠義敘事的模式化描寫，卻是《泣杭錄》各卷衆多歧異點中頗具代表性的一個例子，不妨略予留意。由本卷末署光緒乙未年(1895)的編者後記，可知范承堃乃受丁丙所託，爲配合《泣杭錄》的編纂，才彙刻此一祠志。第四卷是陸楨彙輯的〈崇義祠志〉。此祠乃是地方人士自發所建置，故不同於昭忠祠的官方色彩，而丁氏兄弟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根據此志，崇義祠是咸豐十年亂後，地方人士主動發起建置的，由陸檀（點青，本志編者陸楨之兄，丁丙妻舅）捐地，丁申、丁丙兄弟捐資，探訪杭州受難軍民男婦而祀之。未成，杭州又在第二年遭難，祠燬。杭州收復後，丁氏兄弟出資重建，祠於同治四年落成⁴⁴。據本卷末的後記，陸楨乃應丁丙編纂《泣杭錄》之需要，才提供舊彙祠志，以供刊刻。於此可知，〈崇義祠志〉其實記錄了丁氏兄弟貢獻鄉里的義舉。第五卷孫樹禮編〈義烈墓錄〉，記載左宗棠克杭後爲奉祀無主屍骸而請建的義烈遺阡。根據這個紀錄，丁丙家族同樣在收掩屍骸、建立義祠一事上貢獻很多。在這三卷中，《庚辛泣杭錄》希望呈現亂後的恢復工作，顯然也突顯了丁氏在地方上的重要性。同時，由這三卷紀錄可知，當時在考慮旌恤問題時，將杭州受難軍民都視爲忠義之士，而且將杭州比做睢陽。例如光緒間劉焜(1867-1931)〈謁昭忠祠〉第一首就說：「忠魂十萬此蒸嘗，一片叢祠落照涼。水火刀兵誰應劫，日星河嶽共爭光。故侯庭院空蕭瑟，上將旌旗已渺茫。留取英名與千載，不徒忠義說睢陽。」由於合城殉難者極多，所以官民同祀，更要強調貞烈婦女的事蹟，劉焜的第三首詩便說：「更無貴賤與尊

⁴² 同前註，頁 319。

⁴³ 同前註，頁 349。

⁴⁴ 丁氏兄弟在亂後致力於地方事業，包括修建名人祠墓，如蘇軾、岳飛、于謙祠墓等。爲紀念太平軍陷杭事件而建的崇義祠及義烈墓也是例子。

卑，以死勤王則祀之。慘慘衣冠共塗炭，堂堂巾幗亦鬚眉。」⁴⁵總之，無論官方或民間，在奉祀死難人員時，都採取以忠烈視之的立場，杭州合城軍民都被賦予忠勇抗敵、不屈就義的形象。大體言之，前五卷的文本來源雖不同，但敘事者聲音基本趨向一致，代表官方對太平天國陷杭事件的詮釋。

卷六以降，所收都是不同的個人在杭州戰事中的經歷見聞，焦點是個體的生命，不同於前五卷以群體為中心。卷六乃陳學繩〈兩浙庚辛紀略〉，作於同治元年，當時太平軍仍占有杭州。文後作者自述在亂中倉卒辭家，羈囚窮巷，全家骨肉分離，之後逃往上海，又轉赴泰州，於是將自己兩年中的見聞寫出，「用代一時之談論」⁴⁶。文中記錄作者個人的某些觀察，例如庚申年第一次城陷後，「廿八日午刻有黑氣一道，上沖霄漢」，以及辛酉圍城時餓殍載道的慘狀。還有一些資料則來自作者在城中的見聞，其中關節，也出現在其他的紀錄中，可供比較。例如陳學繩對庚申之役時浙江巡撫羅遵殿(1798-1860)的處理態度的評價是：「庚申……有請戰者，中丞（羅遵殿）怯不能應，人以是咎之，然戰亦未必勝也。」又，談到辛酉圍城時的一樁奸細案，他的陳述是：「星士王道平者，久寓省中，形迹詭秘，衆疑之，擒送協防局，大府未及問，觀者爭剖其肉，俄頃而盡。」對寧波箔工自願助戰的記載是：「廿七日，……城遂陷，進攻滿城，甯人業箔於杭者數千人，助滿人殺賊，滿人由是得全。」⁴⁷這幾個細節，在《泣杭錄》所收各篇文章中都將一再出現，是歷史詮釋的爭議焦點。

第七卷收錄繆德棻的〈庚申浙變記〉。繆德棻為庚申之役殉難按察使繆梓之子，該文乃於光緒年間追記，主要敘述城破前的戰事，尤其是繆梓被難的細節。因此，這不但是一個記憶的整理，更是一個人物形象的塑造工程。讀者很快就會發現，繆德棻的記載與其他記載多有出入。在其記述中，杭城內部的紛亂更勝於太平軍的威脅。例如，同樣寫到寧波人的介入，他說：「甯波之業箔於杭者數千人，以捶錫箔為業，皆甯波人。鼓其氣血之勇，請助官軍擊賊，因給以軍械，令隨於後，見賊輒驚潰。官軍戰數合，以衆寡不敵，亦徐徐收隊而歸。」⁴⁸這項記載便與卷六的〈兩浙庚辛紀略〉有所不同。繆德棻特別突顯援軍不發的問題，例如提到廣西提督張玉良及其前鋒副將向奎在蘇省耽延（「吳中大府〔按：指王

⁴⁵ 丁丙輯：《庚辛泣杭錄》，頁 346-347。

⁴⁶ 同前註，頁 416-417。

⁴⁷ 同前註，頁 413。

⁴⁸ 同前註，頁 419。

有齡，後繼羅遵殿任浙江巡撫〕意謂杭城且失，不及援救，欲……陰固蘇省門戶」），而「米興朝率三千人自徽州來援，戊午至富陽，怯不敢前，縱兵劫掠，鄉民聚眾圍殺，傷亡數百人」⁴⁹。王有齡是當時兩江總督何桂清的親信，而羅遵殿受知於胡林翼，算是湘軍系統，因此繆德棻提及的這一「留軍不發」事件，其實涉及曾國藩與何桂清之間的矛盾。此外，杭州守軍的戰略一一失敗，例如繆梓計畫火攻太平軍據點西竺庵，因大雨而不行；孫懋則「手擲藥包，火反撲，創甚，歸臥寓中」，則幾乎是黑色喜劇效果了。作者認為杭州最大的問題就是軍民內訌，他觀察到：「孤城岌岌，危在旦夕，而杭人方且與各軍為仇，日事修怨洩忿。」例如：「賊之始至，大府下令，飭復勝軍焚附郭民居，則仇結愈深。」同時，軍民之間往往因謠言而離心離德，甚至居民群起殺戮招募來的軍隊，他說：「復勝軍募有潮勇二百，皆廣東潮州人故名潮勇。服飾奇異，言語侏離，遂譁言為賊，伺其入市，即羣聚而殺之，尸僵路隅，以一二百計。」繼之，作者試圖解釋當時的眾議與官員決策之間出現矛盾的原因。例如，解釋居民先要求開城門，後要求開戰，而決策均不許，他說：「忽又譁言城外無一賊，請無庸閉城。……已而杭人知果有賊，則又以官軍不能剋日擊退，訾當事者之畏縮。」⁵⁰作者指出，最後整個杭州城的民意已發展到非理性的程度，奸細案就是最好的例子。繆德棻的故事版本如此敘述：「有王道平者，賣卜杭城十餘年矣，無何，有人疑其通賊，謂已受僞職，為平道王，擒送營務處，請速殺之。發其寓所囊裝，絕無左證，略待鞫訊，觀者已鬻割其肉立盡。」這種狀況都顯示當時杭城「連日恇擾喧闐，借端尋釁，理論不從，勢禁不可，將生內變」⁵¹。在最後一節中，作者敘述父親繆梓在清波門力戰殉身的過程，大致如前文引述國史本傳。作者接著描述城陷一刻杭城內部的衝突，他說：「方賊之入城也，下城居民且謂復勝軍在上城作亂，益爭殺復勝軍，既又不問何軍皆殺之，各軍逃死之不暇，故頃刻間，城上無一兵一卒，而省垣遂陷。」文末並引胡林翼(1812-1861)、左宗棠等人的評論，指杭州之陷，在於省中無將，兵力單薄，而且「官與紳仇，官與官、紳與紳亦仇，民與軍仇，民與民、軍與軍亦仇」⁵²。繆德棻的這篇追述文字，事關其父聲譽，斧鑿之跡頗為明顯。文中提到的封閉城門、留軍不戰、復勝軍與居民的矛

⁴⁹ 同前註。

⁵⁰ 同前註，頁 419-420。

⁵¹ 同前註，頁 420。

⁵² 同前註，頁 420-421。

盾、王道平奸細事件，以及繆梓被難的詳細情形等，若與《泣杭錄》其他篇章通讀，顯然都有爭議性。繆德棻所要爭取的，無疑是對事件的詮釋權。

卷八節錄許奉恩⁵³的《轉徙餘生記》。與此前二卷不同的是，此文並不企圖對事件作通盤的觀察與解釋，而純粹記述個人在戰亂中親眼所見的經驗。正因如此，許氏第一人稱的敘事模式也完全不同於之前各篇。值得注意的是，許奉恩要寫的是自傳，而非國史，只不過他的生命恰巧與重大的國家事件糾結在一起。這麼一來，個人的日常生活與慘烈的戰事，便在文章中形成充滿緊張關係的奇妙結合。開頭先自敘出身桐城的作者在戰前居留杭州的因緣，以及與對鄰才婦的唱和。作者將戰禍突起與私人宴樂作了對比：「園有五色木，芍藥花，朝日（葉季華）司馬就予小酌，以餘滴酌花神，祝其速放。忽蒼頭入報賊大股至湖州，不日即到此，宜早爲計。衆嗤爲譎語。」⁵⁴當然，戰情急轉直下，太平軍果然不日兵臨城下，本文也開始進入日記式敘事，逐日記載戰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敘事是以限知敘事進行的。例如記錄二十五日夜間，紳民協力擊退敵人並修復城牆之後，作者接著寫道：

二十六日，雨益大，晚閒城外礮止火息，耳目俱靜，司馬謂予曰：「日來寢不安席，嘻，甚矣憊，今夜大雨，度賊不來，吾等可安睡一宵矣。」司馬既去，予挑燈孤坐，中心忐忑，遞數更籌，不能就枕。亡何，譙樓鼓絕，窗紙漸白，方欲解衣，突聞礮聲不絕，殆城破矣。司馬宅距城垣半里許，園中假山最高，啓戶張蓋躡其巔，見城上各營兵已起，浙米河干，瞥見一人朱衣狐裘，乘白馬而來，似曰：「起，起，賊已破城，速往攻。」聽之不甚了了，軍士皆荷戈隨之向西而去。不瞬息間，軍士返犇，紛紛棄械，縋城遁。⁵⁵

在這段描寫中，敘事者對情勢只能憑當下的聽覺與視覺猜測、判斷，而且所聞所見，又都是片段的訊息，讓敘事者僅能曰「似」，曰「殆」，曰「不甚了了」。至於「朱衣狐裘」這樣的細節，更是《泣杭錄》所錄諸多記載中所未見。但這樣

⁵³ 許奉恩，字叔平，室名蘭苕館，安徽桐城人，活躍於道、咸、同時期。先後受聘於徽州知府張其仁、浙江學政李國祀、安徽巡撫程懋采、江蘇布政使倪文蔚、兩淮鹽運使方濬頤等人做幕。著有《蘭苕館詩鈔》、《蘭苕館外史》（一名《里乘》）等。其生平大要可參見賀嵐澹：〈前言〉，收入〔清〕許奉恩著，賀嵐澹校點：《蘭苕館外史》（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頁1-2。

⁵⁴ 丁丙輯：《庚辛泣杭錄》，頁423。

⁵⁵ 同前註，頁424。

的敘事，更爲生動地表現了城破當時，城上守軍事出意外，毫無戰力的情況。類似這樣的敘事實串全文，例如寫自己招同親友數人試圖在亂中逃匿的經過：

疾行，抵艮山門大街，剛至半途，則見一綠帷官輿，其杠已折，十餘人四圍，以手舁之行，後隨兵弁數百人，皆受創，血流被體，意是督兵大吏潰而奔，必有賊逐北在後。逢一術，急招四人同入。⁵⁶

同樣的，敘事者提供了細節，例如官輿的顏色與排場，以及隨軍潰逃的情形，這才能解釋自己當時立即的判斷。除此，敘事描寫藏匿民家小屋，窺聽牆外，「但聞群賊噪呼殺妖，其聲慘暴」⁵⁷，而兼「大雨如注」，對讀者造成的恐怖效果十足，堪稱小說筆法。而寫脫逃出城途中所見殺戮之慘，則說：「惟街衢尸積如山，所見者凡三，必須越尸而過。既至太平門，門以內尸盡滿，無隙罅，相與移尸，佝僂彳亍乃得出。」⁵⁸此等描寫以動作（移尸、佝僂、彳亍）代替千篇一律的形容，同樣造成震撼的閱讀效果。最後，敘事回到一開始提到的鄰居才婦陳桂靈，寫她逢難時「罵賊死」，孝烈可風，在敘事結構上也可謂首尾照應不苟。在《泣杭錄》所節錄的自述結束時，杭城已經收復，敘事者則決定不再接受官員的羅致，而按照戰前原本的計畫，前往新安。

筆者之所以在討論此卷時，一再使用敘事者一詞，乃是因爲這篇文章實在是《泣杭錄》各篇中，敘事形式最爲特別，敘事效果最爲成功的一篇。同時，我們也必須面對許奉恩作爲作者的角色定位問題。談到此文的第一人稱敘事，筆者不得不略作脫逸，追蹤一下《轉徙餘生記》的原始。《轉徙餘生記》全文可見於《振綺堂叢書》，而題爲「許奉恩述」、「方濬頤撰」。全篇皆以第一人稱，自述許奉恩在太平天國亂中十年，間關於道，行走十三省，歷經艱險而終於全身返鄉的親身見聞，蓋不僅敘述杭州被難事件而已。方濬頤(1815-1889)⁵⁹任兩淮鹽運使時，許奉恩正是方濬頤的幕賓。查振綺堂版《轉徙餘生記》，方濬頤稱：「吾桐城許叔平，由困而亨，由塞而通，十年之中，天佑善人，歷歷不爽。讀所撰《轉徙餘生事略》，乃深歎所遭之不偶，而學問行誼卓然可傳於世也。……予因就叔平所自述者，舉其大凡而爲之記。」⁶⁰而在〈跋〉中，許奉恩則自稱「欲藉

⁵⁶ 同前註。

⁵⁷ 同前註。

⁵⁸ 同前註，頁 426。

⁵⁹ 方濬頤(1815-1889)，字子箴，號夢園。定遠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同治八年(1869)任兩淮鹽運使，光緒二年(1876)任四川按察使，晚年居揚州主講安定書院。

⁶⁰ 許奉恩述，〔清〕方濬頤撰：《轉徙餘生記》（上海：上海書店，1995年《叢書集成續

鉅製以坳不朽」，獲得方濬頤首肯，而方濬頤「不日脫稿，汰滓生光，芟蕪就簡」⁶¹。據此可知，許奉恩必先有文稿，方濬頤只是爲他掛名，最多做了一點修潤工作。因此丁丙節錄此文，直接把許奉恩列爲作者，而不及方濬頤，是有道理的。尤須注意的是，許奉恩著有多篇筆記小說，筆記小說集《蘭苕館外史》便有方濬頤同治十三年(1874)的序。他本來是個會說故事的人，所以《轉徙餘生記》記述杭州被難的手法較他人不同。我們尤其要考慮此文的自敘本質與虛構的可能性。《轉徙餘生記》全文所要呈現的是十年流離的生命史，許奉恩本身才是敘事的重點，所以雖然寫了很多太平天國動亂的細節，卻是作爲背景而突顯敘事者之耳、目、身、心的體驗。我們不禁懷疑，慣寫小說的許奉恩，在記敘「大時代、小人物」的個人生命史時，運用了多少小說家筆法？《轉徙餘生記》可以，或者應該，當作小說讀嗎？相對的，我們之前在《泣杭錄》中遭逢的那些訴諸客觀、全知敘事的文本，只能當史料讀嗎？我們無法判斷丁丙編纂《泣杭錄》時，是否留意到《轉徙餘生記》的敘事性質，但這確是整部選集裏最有個人特色的一篇。

第九卷〈杭城再陷紀實〉以戰情的介紹爲主。第十卷〈思痛記〉是個人被擄的紀錄。這兩卷的特色較少，此處暫且不論。第十一卷的第一部分是張爾嘉〈難中記〉。以作者個人的觀察，杭州陷落前，太平軍雖占金陵，但「大江以南，靜謐如常」⁶²，故咸豐十年二月十九日，省門忽閉，長毛到矣，作者是毫無心理準備的。作者提供了一些民間的情況，例如鄉間「地棍」趁機「敲竹杠」，洗掠人家，「杭城之避難至鄉者，莫不遭其荼毒」⁶³，後受王有齡巡撫招安，號稱「良勇」，但奪掠如故，只是改名「助餉」，最後還散而投賊。作者敘述自己數次被擄成爲「新傢伙」（新擄者號新傢伙），又僥倖逃脫的經過，也是屬於比較個人性的敘事。第二部分錄張光烈的〈殉烈記〉，摘自作者的《辛酉記》一書，主要記錄作者母親殉難始末。由於母親遇害是作者幼年親眼所見，所以這篇回憶的文字充滿了作者努力面對自己的創傷的痕跡⁶⁴，也是一個極具個人性的例子。此

編》，第25冊影印《振綺堂叢書》本），頁925。

⁶¹ 許奉恩：《轉徙餘生記·跋》，同前註，頁943。

⁶² 丁丙輯：《庚辛泣杭錄》，頁432。

⁶³ 同前註，頁433。

⁶⁴ 張光烈幼年時目睹母親姚氏殉難，成年後把自己改名爲「光烈」，並終生致力於表彰母親。他的文字深深印刻著長年的心理創傷。梅爾清對此有精闢的描述與討論，參見Tobie Meyer-Fong, "Remembrances of a Martyred Mother: Personal Pain and Public Honors in Zhang

外，本文敘述第二次圍城時城中糧盡的情形，「餓夫行道上，每仆而死，氣未絕，兩股肉已爲人割去。」⁶⁵這是一個屢被引述的慘酷紀錄。

第十二卷是秦緬業與陳鍾英的〈平浙紀略〉。本文記錄的是同治二年左宗棠收復杭城前後，並寫到胡光墉（雪巖，1832-1885）受左宗棠賞識之始末。比較特別，而且往往爲後人引用的是文末追寫二次城陷時王有齡自殺殉難，死後柩送到上海，「既至，當事咸臨，奠而發視之，貌皆如生，王公頸帛猶繫，張目忽動，血淚併落，人莫不異之。」⁶⁶這種異象的傳言本是傳統忠義敘事的特色，也是記憶建造工程中的標準程序之一。第十三卷收錄王定安的〈湘軍記〉，王定安乃曾國藩幕僚，這當然就是代表湘軍的立場。本文強調曾國藩、左宗棠對收復杭州的貢獻。此記特別描述曾國藩接獲王有齡求援信的心情：「國藩發其緘，僅血書『鵠候大援』四字，國藩深悲憫之，繞室達旦，不能寐。」⁶⁷突顯曾國藩的形象。然而，曾國藩對杭州陷落的態度，杭州民間實有不同說法，詳下。

十四卷以降，所收皆爲詩作，顯示編者認知了「紀難」類詩作的記事功能。卷十四的第一部分收陸以湑的〈杭城紀難詩〉六十首。陸以湑乃道光進士，晚清著名醫家。根據自序，〈杭城紀難詩〉作於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城陷以後，五月十日以前，可說是捕捉當下的記憶。由諸詩可知，作者對杭城大員輕忽戰況的心態非常不滿，認爲羅遵殿等應負最大責任。例如第一首云：「醜黨潛從僻徑過，庸才防守計蹉跎。忍叫千騎紅巾賊，斷送生靈十萬多。」詩意指太平軍衆原來不過千餘，而主兵者竟然不能即時防禦。第三首云：「森嚴節鉞望如神，濟變無才隕涕頻。坐視萬家罹害酷，不叫勁旅出城闔。」作者自註：「羅中丞……比撫兩浙，惟以勸捐爲急務，而侈然自大，既不能獨運神機，復不能廣收衆策，優柔不振，以至敗亡。」甚至提到：「城破，中丞以殉難聞，民間傳言從賊。蓋怨之深而爲是語耳。」⁶⁸對羅遵殿苛責極深。對王道平一事，作者以爲他確是奸細，而羅遵殿據報卻不速發落，可見其優柔寡斷，故第九首詩云：「大慙欺人小技施，梅花碑下屋臨歧。詰姦枉自多紳吏，當道豺狼竟莫知。」自註云：「蜀人

Guanglie's *Xinyou ji* (Record of 1861)”，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明清文學文化中的秩序與失序」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⁶⁵ 丁丙輯：《庚辛泣杭錄》，頁440。

⁶⁶ 同前註，頁451。

⁶⁷ 同前註，頁453。

⁶⁸ 同前註，頁456。

王道平以星相家言售術于城中，居梅花碑前，歷有年所。城中十門稽察者，有官吏，有紳士，有軍役，皆莫知為姦細也。城破前數日，人見其所往來者，踪迹詭秘，率衆入其室，搜得寇營文檄甚多，拘送中丞。中丞猶不欲遽殺，衆憤齊發，斫而食其肉，心甚黑。蓋歷年窺伺浙江，皆此人爲之主謀。事成，俾守浙江，封平道王，即倒用其售術之名以示巧也。」⁶⁹很明顯，此說與繆德棻在光緒年間追述的〈庚申浙變記〉完全相反。同時，作為文人學士，作者對「舊游」特別戀惜，有詩云：「頻年勝地集朋儔，檀板金尊互勸酬。巖壑猶存人已遠，不堪歷歷溯前遊。」自註：「西湖吳山諸勝，時與諸朋好遊眺，曾幾何時，半爲異物。」又記述寇至西湖當日，適逢觀音大士生辰，「城內士女遊湖者，門內不得入，大半死湖中，香客亦皆被戕。」⁷⁰這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記載。作者除一般性的感嘆以外，也透露了個人的獨特關懷。例如，陸以湑本人對醫學有興趣，所以對杭城一位醫生被難的消息特別有感受。他又提到自己多年蒐集的醫書佚失大半，「怱怱身世百年催，長物何妨付劫灰。惟有奇書難割愛，時時恨觸心上來。」自註說：「余於道光己酉歲至杭，即搜求醫書於坊間及相知之藏書者，東至越郡，北至吳郡，凡得五百餘種，計二千餘卷，手自抄錄者百餘種，計四百餘卷。寇至，棄擲滿地，寇退往視，僅存四分之一而已。」⁷¹文人學士的性情躍然紙上。

卷十四第二部分收許瑤光的〈蒿目集〉。許瑤光爲清末官僚，咸豐後期任嘉興知府，此集是許氏感慨之作，而且都是詳加按語的「時事敘事詩」，顯見作者以詩存史的意思。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羅遵殿與繆梓多有美言，認爲杭民對此二人的怨懟其實出自誤會，而王有齡請撤兩人卹典，則是挾怨報復。至於辛酉年王有齡撫浙，困於無將、無餉、無援，終至淪陷，極爲可悲。他認爲「今則悠悠哆口，淆亂當時」，士夫又以私人好惡排擠已死之人，「更逾數十百年，僅據文飾之奏報，以相品題，而徵信已無自矣！」⁷²許氏的言論是非常值得留意的。他本人對當時戰事的觀察與評論是否恰當，是另一個問題，然而他所提出的現象確實存在，即在《泣杭錄》一書所收，便可看到諸多彼此扞格的論斷，明明仍是時事，卻往往連簡單的事實都有不同的說法。

第十五卷是張蔭榘、吳淦所作《杭城辛酉紀事詩》，有陸以湑（即第十四卷

⁶⁹ 同前註，頁 456-457。

⁷⁰ 同前註，頁 459。

⁷¹ 同前註，頁 460-461。

⁷² 同前註，頁 463。

〈杭城紀難詩〉作者)序,可知這些作品都是兩位作者逃到上海後所寫。作者對每一首詩都作了清楚的案語,所記之事與作者的意見都明白呈現。不難發現作者對後來壯烈殉難的滿城將軍瑞昌很不滿意,先是說他在圍城期間置身事外,詩云:「大將專征寵命加,深居簡出靜官衙。好將盃酒娛衰老,慣對新妝掃髻鴉。」案語明白點出:「賊圍城兩月,人罕見其面。」⁷³後又譏諷他計謀拙劣可笑,有詩曰:

將軍妙語破人顏,衢路諱傳手諭頒。一盞燈籠旗一桿,教人連夜上吳山。⁷⁴此詩的案語說:「瑞將軍昌,諭居民上吳山觀戰者,每人持旗一桿,燈籠一盞,以助聲勢。」⁷⁵緊接著的下一首詩繼續以觀戰為主題,批評守軍:

無端技擊暨材官,鎗礮空施意總安。妙絕行軍等兒戲,胥山頂上有人看。⁷⁶案語說:「居民上吳山觀戰,見我軍接仗,但遙施槍礮而已,為之喪氣。」⁷⁷由瑞昌將軍觀戰的指令,寫到軍民觀戰時見到己軍怯戰的表現,作者將城破前的對峙,描寫為一場舞臺化的戰爭,只是不幸淪為鬧劇。事實上,綜觀多首詩作,可發現作者多次使用「妙」(如「妙語」、「妙絕」),或者「笑」(如「笑煞」、「堪笑」)等反諷之詞,表達悲憤無奈的心情。

最後一卷是王震元編纂的《杭城紀難詩編》。根據編者自序,這是他在難後三十年間陸續蒐集的紀難或者絕命詩作,因為丁丙計畫編纂並出版《庚辛泣杭錄》,所以提供給丁丙,附於書末。由於是輯錄,所收作者甚多,也包括幾個殉節婦女的絕命詩。本卷也收了黃燮清的幾首〈杭城記事——庚申〉詩與〈武林後紀事詩〉(補記辛酉年事)。黃燮清(1805-1864)即黃韻珊,是道光、咸豐年間頗負盛名的戲曲作家。他精擅詩、詞、曲各體,所作甚有可觀。例如記庚申第一次城陷慘狀:

金牛湖上豔陽辰,鶯燕樓臺入戰塵。三月桃花紅犯雪,三月初十日大雪,南方僅見。兩堤煙草碧成燐。湖上焚掠,被害極多。可憐佛國同羅刹,城外叢林,半為賊藪。何處仙源結比鄰。畫舫珠簾零落盡,杜鵑嗚咽弔殘春。⁷⁸

⁷³ 同前註,頁471。

⁷⁴ 同前註,頁474。

⁷⁵ 同前註。

⁷⁶ 同前註,頁474-475。

⁷⁷ 同前註,頁475。

⁷⁸ 同前註,頁495。

他刻意突顯特殊的節氣與杭州的景物，使用綺麗的語言，而使戰爭之慘烈從暗示中浮出。較之直敘戰事的作品，黃氏的詩可謂寓事於情。另一方面，他對庚申之役中若干引起爭議的事件則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有一首詩記載軍中情報錯誤，王道平奸細事件，以及當時城內輿論不統一的情況：

森嚴節鉞鎮江湖，咫尺烽煙偵探誣。賊離城十里，探稱勇潰。變起腹心姦早伏，卜者王道平爲賊間諜，匿省城數年矣，以書敗露，民共磔之。軍無犄角勢先孤。諸軍俱納城中。赤心報國和衷少，白面談兵眾論殊。十萬生靈同浩劫，被難者九萬七千有奇。疆臣定識誓捐軀。⁷⁹

由此詩可知，黃燮清對當時守城官員與軍隊的能力頗爲懷疑，尤其是軍情不足，戰略不能統一等嚴重的問題。大臣雖然誓死捐軀，卻有十萬生靈陪葬，作者褒貶之意已在其中。對王道平事件，黃燮清的認知也是實有其事，並非冤誣，看來這是當時多數人的看法，與繆德棻的說法有出入。同時，對繆梓招募復勝勇以及最後殉職，黃燮清也傾向評斷爲錯誤決策，有詩云：「亡命屠沽氣燄張，一時應募備戎行。窮搜玉帛驚雞犬，虛擲金錢豢虎狼。都轉繆所募復勝勇，皆凶悍不馴，白晝剽掠。釋甲盡更紅抹額，倒戈翻試綠沈鎗。賊由清波門緣城而上，勇即大呼城陷，須臾盡變賊裝。臨危反噬嗟何及，一死模糊事可傷。都轉爲勇所戕。」⁸⁰國史本傳說繆梓乃力戰而死，但根據許多民間的記載，他卻是被自己招募的傭兵倒戈而從背後刺殺的。我們也可注意，黃燮清的體例是自己下註腳，說明某句的特定歷史背景，這顯示他對詩體的記事功能不完全滿意，也刻意要避免讀者的猜測與誤讀。

以上是《庚辛泣杭錄》十六卷的介紹與討論。此書之編纂，已在杭州陷落又收復的三十餘年後⁸¹，丁丙也已從當年奔走搶救文瀾閣的年輕士紳，成爲受過皇家封獎的地方重要人士，但是晚年的他必然認爲兩次城陷的經驗必須透過輯錄的工作，集中保存下來。此書十六卷所蒐集節錄的文字中，除〈欽訂勦平粵匪方略〉是官方文書，王定安的〈湘軍記〉廣爲人知以外，其他各篇都少見流傳，作者也未必是知名人物，若非丁丙蒐集之功，未必能保存下來。丁丙一生的各項編纂工作，都與杭州地方文史有關，實在是一位集體記憶的蒐集者，甚至可說是創

⁷⁹ 同前註，頁 496。

⁸⁰ 同前註。

⁸¹ 《年譜》據丁丙《宜堂小記》指出，《庚辛泣杭錄》於光緒二十一年（丁丙六十四歲）二月開始編輯，十一月刊畢。見〔清〕丁立中編：《先考松生府君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第5冊影印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頁210。

造者。《庚辛泣杭錄》是丁丙編纂工作中規模最小的，卻是唯一完全以當代史事為中心而設計的。一方面經過了三十年的沉澱，一方面庚辛之役的倖存者仍多有在世者，餘痛猶存，作為輯錄者，丁丙理論上很容易以權威者的姿態出現，為庚辛之役的種種做出最後評斷。誠然，由〈崇義祠記〉等篇章看來，丁丙在亂後貢獻很大，他顯然也準備透過《庚辛泣杭錄》，將這些紀錄進一步流傳下去，鞏固丁氏在地方上的地位。由各卷的序文可知，丁丙對收錄情況是絕對掌握的，多數都由他本人邀集。因此，各卷所發出的個別的聲音，應該匯集為一個整體的聲音，代表總編纂者丁丙認可的庚辛史實與史論。然而最後的結果其實更為複雜。因為不但丁丙選擇隱身於各卷的作者或編者之後，各卷文字之間，更在表面上表忠義、哀黎民的共識下，出現許多細微但至關重要的歧異。編纂者顯然並不打算消泯這些矛盾，而是沈默地將之呈現出來。筆者以為，丁丙雖然認為戰後三十年已到了輯錄資料的時候，但他並不打算為庚辛之役提供最後的版本。這可能是一位終身的文獻編纂者本有的面對材料的習慣。無論出於刻意或無意，《庚辛泣杭錄》的編纂突顯的是太平天國陷杭史事的複雜性，尤其是當時杭州居民對戰役攻守的分歧態度。換言之，《庚辛泣杭錄》最後表現出來的是一個文本的公論空間。當然，此中完全缺乏太平天國一方的觀點。

《庚辛泣杭錄》之編輯出版，與陷杭事件之間長達三十年以上的時間差，還可進一步討論。集中所收的文字，多成於亂中或者亂後不久，早可輯錄。其實，丁丙的著作中，還有《宜堂日記》與《宜堂小記》兩種，都是丁丙對親身經歷的第一手紀錄，因為並未刊行，已佚。丁丙之子丁立中在編輯《先考松生府君年譜》時，引用了不少其中的資料，尤其是兩次陷杭時期的紀錄，都是飽富細節的一手時事報導，也不乏個人對當時主事者的評論，若論記事的價值，應可與《庚辛泣杭錄》所收各篇相掎。那麼何以丁丙完全不選錄自己的文字？這恐怕不能只從謙抑的編者姿態來解釋。我以為時間的延宕與文本的選擇，兩者都指向親身歷劫的丁丙面對創痛的態度與方式。丁丙兄弟在亂後投入地方重建，包括收埋、撫賑等，都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次則修建學校、祠墓等，可謂地方文化基礎；又陸續輯錄刊刻與杭州歷史文化有關的作品，如《武林掌故叢編》、《杭郡詩輯》等，乃至《武林坊巷志》，這些都是經由文本的纂輯，以保存杭州歷史文化記憶的努力。《庚辛泣杭錄》在這一系列工作中，時間的排序較為靠後，而且不直接收錄編者的作品，主要是因為這個集子不只是記憶的蒐集以及事件的複習，也同時必須提供療傷止痛以及歷史詮釋所需的距離。

再者，如果比較《庚辛泣杭錄》與民國後出版的杭州資料中的庚辛之役，前者容忍紛雜的特色也更為明顯。試以鍾毓龍的《說杭州》為例。鍾毓龍是杭州學者及教育家，《說杭州》成於杭州被日軍占領期間，他參考了各種資料，以全面介紹杭州的歷史文化。在庚辛之役一節，作者綜合各種紀錄，以及聞諸父老的說法，做出個人的推斷，重組兩次城陷的情況。《庚辛泣杭錄》所收錄的各篇，也都是鍾毓龍參考的材料。事實上，鍾毓龍也指出各種「見證人」的紀錄彼此往往矛盾，而且後人難以判斷是非。例如繆德棻與許奉恩對杭州守軍人數的估計，相差不只兩倍。鍾毓龍也提到杭人多半深恨羅遵殿不早出戰，但其功過其實不得而知。至於復勝軍（潮勇）的角色，王定安稱其通敵，而繆德棻則聲稱杭人多疑而刺殺二百潮勇，兵卒紛紛逃死，以致城陷。鍾毓龍指出，此說「直以省城之陷為杭人妄殺之所致，而兵士與帶兵者皆無罪，此可怪也！」⁸²所以鍾毓龍認為繆德棻所言純粹是為了回護父親。鍾毓龍更提出，〈湘軍記〉說曾國藩接獲王有齡血書，深為悲憫，但他本人聞於父老的版本，則說曾國藩聞杭州城陷，拍案大叫：「吾事成矣！」蓋喜其「長圍蹙敵」戰略即將成功⁸³。凡此種種，鍾毓龍皆直接指出矛盾所在，而且雖然宣稱事實難以評斷，其實則以自己的見聞與識見，為讀者建議適當的讀法。另一方面，根據紀錄，庚申一役中，杭州錫箔工助戰守城，與丁丙兄弟的號召有關⁸⁴，此事之功過眾議不一，而丁丙並未因事關自家，而在《庚辛泣杭錄》中提出統一的意見。由此一比較，我們更能清楚看到《庚辛泣杭錄》多音的特質。

本節最後，筆者想討論一個《庚辛泣杭錄》未收，但相當有趣的文本，這是趙烈文(1832-1889)的《庚申避亂實錄》⁸⁵。趙烈文是曾國藩與曾國荃幕僚，他的這篇文章曾在一九一七年《小說月報》上刊載過，原名「庚申日記」，記載咸豐十年太平軍陷江浙的經過。趙烈文是常州人，當時他也不在杭州城內，所以在杭州陷落這部分的描述，其實是以旁觀者的立場出發的。當然，所謂旁觀者，並

⁸² 鍾毓龍編著，鍾肇恒增補：《說杭州》，頁 340。

⁸³ 參同前註，頁 347。

⁸⁴ 丁丙之子丁立中編纂《先考松生府君年譜》，根據丁丙《宜堂小記》（佚）的記錄，指出「（庚申年二月）二十日，先伯竹舟公（丁申）偕府君勸集箔業工人助守城」。據丁立中的引述，丁丙對丁申促成箔業工人助戰一事，相當肯定。參見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譜》，頁 28-29。

⁸⁵ [清]趙烈文著，謝五知校訂：《庚申避亂實錄》，收入謝興堯輯：《太平天國叢書十三種》（臺北：華文書局，1969 年影印瑤齋叢刻本）。

非漠不關心，畢竟戰況吃緊，整個江浙都很危險，而是強調城外之人的「想像」層面。由於是日記體，作者的記載有很多透露個人心理及觀察傾向的細節。筆者以為其中對戰爭意象（實為「異象」）的興趣特別有趣。以下幾節文字便是很好的例子：

十四日己酉，風沙蔽天。自初間至今十許日，淒風苦雨，間露日色，晶白無光，宛然癸丑春賊初至時景象，寒冷異常，風如潑水。

十一日乙亥，嚴寒大雪。季春氣候，如十二月，七十老翁未見斯異。天垂肅殺之象，兵禍恐不如是而止。夜有白光互天，末為三歧。

十六日庚辰，夜見白虹掩月上，長丈餘，橫亘而直，晶晶有光。

日暈紫赤，天象昭然。

三月朔日乙丑，日赤如血。午後霰，夜又霰，寒如臘九。是日聞杭州於二十七日失陷。先是，某自省城來，言十八日賊初至時，諸城門驟閉，城中男女數十萬，露立雨中，冀城門或開，街衢推湧如潮。一輿至值百千，然駕肩輿而出，無不擠碎，輿中人傾跌，頃刻如泥。行人足不得著地，死者不可勝計。城中乏糧，土匪紛紛思變。至二十七日，賊乃以城外積棺，疊架登，城遂陷。此後淫殺之慘，思之肉戰。⁸⁶

趙烈文這一部分的日記，幾乎完全在戰爭的陰影籠罩之下。凡記敘重大歷史事件，天氣往往為敘事者特別點出。趙園便認為甲申之變的記述中，天氣參與了當下氣氛的營造⁸⁷。趙烈文的記事把天氣這個因素特別放大，並賦予神秘的預言力量。作者認為自己見到各種天象的預示，而且其意義完全昭顯，不需猜測。等到杭州城破的消息傳來，作者的感受可能不是新聞，而是預言的實現。而人類對戰亂的想像使人「思之肉戰」，吾人在《庚辛泣杭錄》中讀到的許多慘酷紀實，竟只是這想像之詞的註腳了。

四、不堪回首話秋燈——一個消失於庚辛之役的風流文人

在本文最後一節，筆者不準備繼續討論有關杭州庚辛之役的筆記、日記、敘事詩或資料輯錄。作為結語，我將刻意打破歷史敘事的表面邏輯，回到一位個別

⁸⁶ 同前註，頁 253、255-256、254。

⁸⁷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2。

的杭州文人，簡短勾勒他於十九世紀中葉在杭州度過半生詩酒生涯以後，在辛酉圍城中的最後結局，藉以對比當時杭州文人在亂前普遍的生活情趣，以及亂後的苦難災厄。筆者之所以如此，乃是在閱讀許多戰爭記事的文字後，深感無論是事件虛實、人物評價，或者歷史詮釋，都具有飄忽不定的本質。那些掛上客觀紀錄面具的篇章，並不能一槌定音，為太平軍陷杭事件找到固定的座標，反而若干回歸個人眼目、身體與情感的文字，提供我們體會創痛（而非認識史實）的門徑。如是，則我們亦不妨放下大敘事的企圖，把眼光轉向一個似乎無關緊要的杭州無用文人。

這位文人便是著有《秋燈瑣憶》的蔣坦(1821-1861)。此人及其寫夫妻閨中生活的《秋燈瑣憶》因為有提倡小品的林語堂品題，一度頗為人所知。蔣坦的妻子關瑛（又作「關缺」，字秋芙）約於一八五五年左右病故，而《秋燈瑣憶》則作於秋芙生前，所以其中所敘都是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湖生活。蔣坦是鹽商之子，善文章，工書法，曾從我們前面提到的黃燮清遊。後厭棄舉子業，致力於詩及古文辭。這對夫妻離開杭州城內東倉巷中父母的宅第，住在水磨頭的枕湖吟館。據蔣坦所作《西湖雜詩》，他與秋芙居於西湖十年，多由家中月給數十金以資鹽米。他們的生活情調，可由下引這段文字窺見：

秋月正佳，秋芙命雛鬟負琴，放舟兩湖荷芰之間。時余自西溪歸，及門，秋芙先出，因買瓜皮跡之，相遇於蘇隄第二橋下。秋芙方鼓琴作〈漢宮秋怨〉曲，余為披襟而聽。斯時四山沉煙，星月在水，琤琮雜鳴，不知天風聲環珮聲也。琴聲未終，船舻已移近漪園南岸矣。因叩白雲菴門。菴尼故相識也，坐次，採池中新蓮，製羹以進。香色清冽，足沁腸腑，其視世味腥羶，何止薰蕕之別。回船至段家橋登岸，施竹簟於地，坐話良久。聞城中塵囂聲，如蠅營營，殊聒人耳。橋上石柱，為去年題詩處，近為蟻衣剝蝕，無復字跡。欲重書之，苦無中書。其時星斗漸稀，湖氣橫白，聽城頭更鼓，已沉沉第四通矣。遂攜琴刺船而去。⁸⁸

雖說嫌棄城中塵囂，但他們的生活可謂兼得西湖風月之趣與杭州城市之便。這段時間，蔣坦不但得享閨房之樂，也與杭州文友過從甚密，據其傳記，夫妻二人設立吟社，家中時常高朋滿座，凡春秋佳日，常與友人乘畫舫玩遊孤山，到了夏天，夫妻則避暑於杭州附近西溪的別墅。由於風雅好客，西泠才人莫不知秋芙女

⁸⁸ [清]蔣坦：《秋燈瑣憶》（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頁3-4。

士之名。根據蔣坦自己的陳述，他與杭州以外的文人也有交往，例如他二十幾歲時作的《西湖雜詩》中就有這樣的記載：「余蓮村來游武林，以惠山泉一甕見餉。……蓮村止余草堂十有餘日，剪燭論文，有踰膠漆。」⁸⁹余蓮村就是前文提到過的余治，後來的大慈善家，太平天國期間曾刊行《江南鐵淚圖》等書以募款救災。一度抵掌論心的兩個友人，後來的發展竟如此不同，吾人以今視昔，不覺爲之深嘆。

秋芙有幸，在亂起之前已經故去。太平軍犯杭州時，蔣坦也在圍城中，刁斗烽火，夢寐驚心。後來杭州城失陷，蔣坦與其家眷屬僥倖不死，太平軍退走以後，便攜子妾及姻戚數人逃往慈溪，投靠友人。後來，王有齡到任，整頓戎備，招集流亡，局勢看來頗有起色。蔣坦思念故鄉風景，便決定返回杭州。不料此時剛好太平軍再次攻打杭州，西子湖頭都是炮船，羅網遍地，無處避逃。圍城已久，蔣坦藏匿敗巷，家中斷炊，全家骨肉相繼僵斃。這年冬天，杭城二度失陷，此時，蔣坦已在圍城中凍餓而死。年約四十。生活在十九世紀中期，處身杭州富室，又享盡西湖風流的這個文人，在戰亂中只是杭州街頭無數「惻惻無人色」，鳩面鵠形的餓殍之一。這個結尾，實在並不淒美，而且雖然埋骨於圍城中，也稱不上什麼忠義之士。若一面讀《秋燈瑣憶》，一面想起圍城時人仆於道的場面，大概情味全失。當年放舟兩湖荷芰之間，厭聽城中市聲的蔣坦，以及許多與他一樣的杭州文人雅士，何曾一念及於戰爭，然而一旦兵臨城下，那麼離亂之苦便將抹去一切，使得他們最終成爲倖存者的戰爭記事中的一個模糊受難形象。

最後要補記一段因緣。筆者在此重述蔣坦的生平，資料大多取自丁丙所作的〈蔣文學傳〉⁹⁰。丁丙是蔣坦的友人，因爲要替他刊行遺作《西湖雜詩》，所以爲他寫了這篇傳記。離亂之世，人生的命運交錯至於如此。我們便權且把這當作戰爭的餘音吧。

⁸⁹ 同前註，頁4。

⁹⁰ 參見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27冊，頁622-624。

離亂杭州

——戰爭記憶與杭州記事文學

胡曉真

這篇論文試圖閱讀一系列與戰亂概念相關的記事文學，而聚焦於杭州，特別是與太平軍兩度陷城前後有關的材料。

本文主張，根源於綿長的歷史與苦澀的集體記憶，使得杭州的繁勝，總是暫時遮蔽著隨時可能破出的幽黯，與感傷、神秘、危險、毀壞以及死亡緊緊相連。故而，秀麗的山水，慘酷的兵劫，忠烈的英雄，薄命的佳人，這些都是共同組成杭州歷史記憶的重要質素，而且互相產生聯想。因此，當我們接觸杭州各種文史資料時，這些看似矛盾的力量都同時湧現。同時，傳統上以為奢靡浮華的惡習會招致天譴，但浮靡是城市的本質，是城市的原罪。故而，杭州在清代咸豐年間遭遇太平軍兩次攻陷，便被詮釋為這個城市發展到「無美不備」以後註定的結果。

杭州文人對庚申、辛酉城陷的處理，多用日記、回憶錄等形式保存自己的經驗，並為杭州留下地方性的歷史見證。這種由地方意識出發的文本努力，可以丁丙編纂《庚辛泣杭錄》為代表。此書乃搜集與庚辛之役有關的官方及私人紀錄多種，合為一帙，分十六卷。《泣杭錄》之編纂，已在杭州收復的三十餘年後，作為輯錄者，丁丙理論上可以權威的敘事聲音，為庚辛之役的意義做出最後評斷。然而丁丙卻選擇隱身於各卷的個別作者之後，全書更在表面上表忠義、哀黎民的共識下，出現許多細微但至關重要的歧異。編纂者顯然並不打算消泯這些矛盾，而是沉默地將之呈現出來。筆者以為，這種編輯策略一方面出自一位終身的文獻編纂者本有的面對材料的習慣，一方面則要突顯太平天國陷杭史事的複雜性。丁丙是一位集體記憶的蒐集者，甚至可說是創造者，而《庚辛泣杭錄》則成為文本性的公議空間。

關鍵詞：杭州 太平天國 丁丙 《庚辛泣杭錄》

Hangzhou in Disorder: War Memory and Event-Recording Texts about Hangzhou

HU Siao-che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a series of texts recording events and ideas of war and disorder, with a focus on Hangzhou and the events of its two occupations by Taiping arm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 argue that, because of Hangzhou's long history and painful collective memories, the city's prosperity and glory served as a façade covering the darkness that was poised to break out with an outburst of remorse, mystery, danger, destruction and death. Therefore, Hangzhou's historical memory is an amalgam of beautiful scenery, brutal wars, martyred heroes and misfortuned heroines. A further factor is the conventional belief that extravagance leads to providential condemnation. It explains why the two occupations of Hangzhou by the Taiping armies in the 1860s were understood as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the city's perfected state of luxury.

Dealing with the two occupations by Taiping armies, the Hangzhou literati often chose to use the form of diary or memoir to record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preserve localized historical testimonies for their hometown. *Gengxin qi Hang lu* (Record of weeping for Hangzhou in the Gengshen and Xinyou years), edited by Ding Bing, is an example of such textual works motivat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local identity. This work is a collection of both official and private records recounting the two occupations in the years of Gengshen and Xinyou. It was compiled and edited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fter Hangzhou was reclaimed from the Taiping armies. As the editor, Ding Bing had the opportunity to finalize a judgment of the two occupations with his authorial narrative voice. However, he chose to conceal himself behind the individual author of each chapter. More important, though given the shared goal of glorifying loyalty and lamenting the loss of lives, the work reveals many small ye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tails and opinions. Ding Bing was a collector, or even a creator, of collective memories. He made his *Record of Weeping for Hangzhou in the Gengshen and Xinyou Years* a textual space for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Hangzhou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Ding Bing
Gengxin qi Hang lu

徵引書目

- 丁丙：〈蔣文學傳〉，收入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27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 丁丙編：《庚辛泣杭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66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 年。
- 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譜》，收入《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第 5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
- 王思任：《避園擬存詩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78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
-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收入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3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 沈新民：《清丁丙及其善本書室藏書志研究》，臺北：漢美圖書公司，1991 年。
- 胡曉真：〈聲色西湖——「聲音」與杭州文學景味的創造〉，《中國文化》25/26 期，2007 年秋季號，頁 72-92。
- 范祖述：《杭俗遺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 年。
- 翁福清：〈杭州鄉邦文化的功臣——丁丙〉，《東方博物》第 14 輯，2005 年 1 月，頁 75-79。
- 寄雲山人（余治）編：《江南鐵淚圖》，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
- 康正果：〈泛文和泛情——陳文述的詩文活動及其他〉，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張岱：《西湖夢尋》，《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年。
- 許奉恩述，方濬頤撰：《轉徙餘生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25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5 年。
- _____，賀嵐澹校點：《蘭苕館外史》，合肥：黃山書社，1996 年。
- 陳文述編：《蘭因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38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 年。
- 楊維禎編：《西湖竹枝集》，收入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26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 趙烈文著，謝五知校訂：〈庚申避亂實錄〉，收入謝興堯輯：《太平天國叢書十三種》，臺北：華文書局，1969 年。
- 趙園：《想像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
- 劉一清：《錢塘遺事》（選），收入《四時幽賞錄外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劉基著，林家驪點校：《劉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蔣坦：《秋燈瑣憶》，上海：世界書局，1935 年。
- 黎遂球：《西湖雜記》，收入丁丙編：《武林掌故叢編》第 5 冊，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 / 華文書局，1967 年。
- 鍾毓龍編著，鍾肇恒增補：《說杭州》，收入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1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年。

- 瞿佑：《樂府遺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2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顧希佳選註：《西湖竹枝詞》，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 年。
- Hanan, Patrick. “Fengyue Meng and the Courtesan Novel.”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8.2 (Dec. 1998): 345-372.
- Huntington, Rania. “Chaos, Memory, and Genre: Anecdot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7 (Dec. 2005): 59-91.
- Meyer-Fong, Tobie. “Cities of Sin: The Taiping War as Retribution for Urban Excess.” 「進入中國城市：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 年 12 月 13-15 日。
- _____ . “Remembrances of a Martyred Mother: Personal Pain and Public Honors in Zhang Guanglie’s *Xinyou ji* (Record of 1861).” 「明清文學文化中的秩序與失序」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 年 8 月 28-29 日。